

SOCIETY AND
CULTURE SERIES

社会与文化丛书

观念如何塑造制度

曹正汉 著

上海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上海人民出版社

观念如何塑造制度

曹正汉 著

本书出版获浙江大学十五规划“211工程”之“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项目资助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念如何塑造制度/曹正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社会与文化丛书)

ISBN 7-208-05859-8

I. 观... II. 曹... III. 经济社会学—研究

IV. F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7622 号

责任编辑 田 青

封面装帧 王小阳

·社会与文化丛书·

观念如何塑造制度

曹正汉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02,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859-8/C·221

定价 19.00 元

序一 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探索

■ 1

张曙光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中国书评》为主要阵地,曾经发起了“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大讨论,全国二十多家学术刊物陆续发表了百多篇讨论文章,有的还开辟了讨论专栏,多家学术机构以此为题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有的甚至还采取了一些联合行动,邓正来教授将此次讨论的文章、发言汇集在一起,编辑出版了《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2004)。虽然规范化和本土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此次讨论的中心是规范化,本土化只是略略提到,并未展开讨论。这种情况也许与当时中国学术界严重的失范现象有关。这次讨论是中国学术界自觉净化学术场域的一次努力,其所取得的成果是,一方面批判了各种失范行为,另一方面逐渐建立了“匿名评审制度”,形成了注释体例和参考文献规则等,解决了规范化的一些浅层的技术性问题,至于学术生态和知识生产的制度结构之类的深层问题尚未涉及。最近,《中国书评》复刊,发起了学术规范化的第二次讨论,讨论的中心在于对现有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

什么是本土化?本土化并不是指提倡国学,也不是在世界学术市场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权威的本土评价系统,它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立足本土有关,其中心不在于知识的分类,

而在于知识原初经验的来源空间。规范化并非要改变本土知识的性质,而是让它具备专业知识的样式(张静,1995),进而融入人类知识的宝库。具体到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通常认为,所谓本土化就是要使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经济问题,即研究对象的本土化(1995)。现在,曹正汉博士的新著《观念如何塑造制度》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经济学理论的本土特征”,它“不仅包含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而且指建构的理论模型必须与中国人的行为特征相契合,因而与中国文化的特征相契合”。据此,正汉认为:“中国经济学需要与国际接轨的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规范,而当我们用经济学方法建立解释中国经济与社会现象的经济学理论时,所面临的问题就不是‘国际接轨’的问题,而是如何立足于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和中国本土经验的问题。”这是正汉博士从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学研究本土化探索的进步和深入。由于经过“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本土化已经为中国学术界共同认可和接受,正汉博士的探索也未超出本土化所涵盖的范围,故没有必要将本土化仅仅局限于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同时再提出和使用一个新的概念以与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概念相区别。这样,新的概念不仅难以被学术界认可和接受,而且还会产生不必要的歧义和混乱。

我与正汉博士的接触和交往是从2000年开始的。当时他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有一天到我家来拜访,我们聊了半天,谈得还比较投机。此后交往多了起来,特别是他进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我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兼浙江大学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会主席以后。我每年两次去浙大讲学,他几乎都要去宾馆拜访和交谈。他参加了本人主持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立项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课题第四批和浙大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第五批《浙江卷》的研究,并将他的其他作品送我。正汉博士为人忠厚质朴,做事踏实认真,对于他的学问之路,我还是比较欣赏的。

正汉博士比较注重现实,其观察和思考总是立足于本土,力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进行研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崖口村为对象,做的是“信念、效率与制度变迁——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的公社制度及其演变(1980—1999)”,博士后研究课题继续做市场环境中的公社制度研究。为此,他从1999年开始六次去崖口进行调查,不仅查阅了相关的档案资料,而且与主要当事人促膝长谈,同时还深入到农户家中进行访问,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围绕着这一对象的研究,他一做就是五六年,写出了《伶仃洋畔的村庄公社》(2004)等著作和论文,从多个方面对市场环境中公社制度的存续和变迁进行了解释。也许有人对此不屑一顾,但我却为这种问学的精神称道叫好。其实,小事情可能有大意义。像崖口这样的村庄公社在中国并非只此一家,而是各地都有,且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招数,各有各的合理之处。对此做出全面的事实描述和理论上的解释,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当初也不被看好,现在却成为社会学的经典被人们从多方面解读和引证,就是最好的证明。

正汉博士的知识结构比较全面,大学专科和本科学过6年数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6年读经济学,博士后又做社会学研究。现在虽然以经济学研究为主,但广泛吸取了社会学的

理论和方法,对于数学工具的运用也相当熟练。这在《观念如何塑造制度》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反对那种笔者称之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所谓理论研究和宏大叙事,对于那种只有数学模型推导而无经济含义的做法更是不感兴趣。《观念如何塑造制度》之所以能够推进经济学理论本土化的探索,既与他注重实际的研究道路有关,也与他进行的跨学科思考有关。因此,突破经济学的范围,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许是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如果说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借助于数学工具和数学方法是为了使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更加严密,更加精确,那么,经济学研究与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以及哲学的交叉和融合,则是为了拓展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避免经济学的理论局限,丰富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否则,如果把经济学研究仅限于数学公式的推演,那么,这种研究就会陷于有技术、没思想,有知识、没文化的可悲境地。同样,如果只是一些经济现象的简单归纳和描述,而提升不到理论的高度,构建不了一个一般化的逻辑体系和理论模型,这样的研究也没有多大意义,还不能叫做经济学理论。

正汉博士的问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国学和中国历史也比较感兴趣。他读了国内外国学大师的很多著作,经常从这里吸取营养,得到启发和借鉴。在《观念如何塑造制度》中,引述的不仅有《易经》、《论语》、《中庸》、《史记》等,而且有梁启超、梁漱溟、钱穆、黄宗智等。他坚持的本土化的研究道路和研究结论,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包括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因为,这是本土化的基础一环,离开了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本土化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而正汉博士又正

确地指出,本土化并不限于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而且包含着研究内容的本土化,即在构建理论模型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其所选择的经济、政治、社会变量及其相互关系要能够体现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在《观念如何塑造制度》一书中,正汉博士正试图努力去实践,去探索。从对本书的阅读来看,笔者认为,正汉有些地方做到了,有些地方似乎还有可讨论之处。

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最基本的行为假定是理性行为或者最大化行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是抽象的理性、完全的理性和孤立个人的理性。这种理性虽然来自于西方文化的个人独立和自由权利意识,但是,由于人既不同于动物,也不是原子式孤立的个人,人不仅有人性,而且有社会性,是社会人,因而,上述假定的确与现实距离太远,对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个人行为尚且解释力有限,何况生长在东方文化环境中的中国人。于是,出现了“有限理性”(西蒙,1989)和“交往理性”(哈贝马斯,1994),接着又提出了“情景理性”和“过程理性”,认为理性与否要依赖于具体情景,而不可能有抽象的理性(汪丁丁等,2005)。因此,正汉博士指出,构建解释中国经济的理论模型,必须符合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和中国文化的特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将新的理性假定具体化的一种探索。因为,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个人独立和自由权利意识,渗透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是一种关系网络和关系意识(胡必亮,2005)。关系不仅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能够调动和配置资源的资源(陈俊杰),因而,旧的关系网络的弱化和解体必然伴随着新的关系网络的形成和强化。这一点也许最能够体现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和中国文化特征。如果能够立足于此,将其作为一种中间结构,找到个人独立和

关系网络的契合点,将几个案例整合起来,说明观念如何塑造了制度,也许就有了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但在现有的体系中,这一点是看不到的,几个案例是相互孤立、互不联系的。如果说,在第四章“民营企业在组织结构上的政治特征:温州的案例”中,作者在与基督教新教伦理的普适原则相比较中,提出了“特殊关系取向的谋利精神”,但对此并无独立而明确的意识,强调的是与“普适”相对应的“特殊”,而不是贯穿于中国人行为背后的、左右着行为选择的种种关系(其实,民营企业建党无非是适应环境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网络),那么,在讨论崖口村庄公社的案例中,这一点已经置于相当次要的地位,作者并没有从新的关系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提出和讨论问题。至于禄村案例也许是不必要的,它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案例,只是说明了最大化的两个不同方向和禄村小地主的价值取向,而且与关系网络无关。如果以此说明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走向现代化也许还有点意义,而对于现实的制度变迁则似乎意义不大。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书中的几个案例还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挖掘。比如,温州案例讨论的民营企业的建党问题,如果与国有企业加以比较,就可能有一些新的发现。在中国现行的制度环境中,党的领导是普照之光。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建有党的组织,而且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党的组织和党委书记居于企业工作的领导核心。也正因为如此,在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后,党委书记和厂长经理之间谁为主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但是在民营企业中,从一开始就没有党的组织,企业经营完全由私营企业家做主,即使在企业做大以后,控制权也牢牢地掌握在老

板手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民营企业与党的组织似乎是格格不入的。但在党领导一切的大环境下,搞好与党和政府的关系,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协商能力,不仅是保护私有产权的重要途径,而且是获得政府资源的重要办法。于是,民营企业家不仅要经营企业,而且要关心政治;不仅要入党和建立党委,而且要进入人大和政协;不仅在言论和行动上要拥护,而且在组织上要进入体制内。这种选择一方面是由于理念的认同,另一方面更多地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虽然民营企业中的党委与国有企业中的党委都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但其地位和作用有着本质的差别。其名义地位可能不低,但实际权力却很小,党委书记通常无权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在运作关系要素,沟通企业内部信息,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特别是妥善处理职工与老板之间的关系,应对和满足当地党政领导的需要,获取政府资源方面,却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因此,机构名称的相同虽然重要,但实际职能的差异可能更为关键。如果说国有企业中党委是上级规定和外部施加的,可以成为超乎企业控制权之上的力量,那么,民营企业中的党委则是自主设立和自然生发的,只能处在企业权力的控制之下,并且也许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制度的一个有机和有效的组成部分。这也可能预示着国有企业党组织改革的方向。在这里,笔者以为,温州民营企业家的价值取向不见得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从西方文化语境中拿来的一個概念。人们只能在现有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框架下行动,如果连环境都适应不了,何以改变环境。其实,适应就是改变,在适应中改变可能是制度变迁的一个更有效的途径。既然如此,倒是另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即民营企业家的关系意

识和关系运作及其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果从关系和关系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崖口村的案例,那么,崖口不仅是一个村庄公社,而且是一个社区自治组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具有多方面属性的、中国式的关系共同体。主导其发展和变迁的虽然有陆汉满“保护弱者,按劳分配”的理念,但借助的仍然是关系资源,其保留公社体制和滩涂资源,借助了与军分区的关系和力量,陆汉满的人格和力量也在于他掌握和运用关系资源,驾驶村庄组织和市场规则的技能和艺术。不要说核心制度收缩和边缘制度创新,就是允许村民离开村庄和自由择业而又保留其回村的成员权,也与传统公社体制不同,给了村民某种用脚投票的权利。这种做法既利用了市场的原则和力量,增大了村庄的资源基础,又减少了对维持公社体制的反对和阻力。保留成员权对于关系共同体的巩固和维持也是极其重要的。

以上的议论不是要否定《观念如何塑造制度》一书的主题和思想,而在于提供一条将制度分析中国化时可以思考和开拓的途径。至于《观念如何塑造制度》的结构安排,经过几次修改,崖口村庄公社的案例由原来的三章先减成两章,最后并成一章,至少解决了形式上的不协调问题和内容上的重复问题,对于作者现有研究的状况来说也是适当的。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崖口的村庄公社不是只此一家,且具有某种代表性,是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一种很有趣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对崖口的村庄公社可以做长期的系统观察和跟踪研究,以便有新的发现,并做出新的开拓。

承蒙作者抬爱,是以为序。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2. 张静:“规范化与专业化”,载《中国书评》1995 年 3 月总第 4 期。
3. 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载《经济研究》1995 年第 10 期。
4. 曹正汉:《伶仃洋畔的村庄公社——崖口村的公社制度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
5.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6. 罗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
7.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两卷),洪佩玉等译,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
8. 汪丁丁、韦森、姚洋:《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9. 胡必亮:“关系共同体”,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第 4 卷),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10. 陈俊杰:“关系资源与农民的非农化”(打印稿)。

2005 年 7 月 27 日初稿

2005 年 8 月 12 日修改,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序 二

史晋川

曹正汉博士所著《观念如何塑造制度》一书,运用理论文献与中国的现实案例说明文化观念如何影响社会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曹正汉博士在致力于这一项工作时,一个特别之处是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相结合,故他建立的理论模型既有经济学的特征,也有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痕迹。为了说明曹正汉博士在分析方法上的特点,请允许我简要介绍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经济学家分析制度现象的基本框架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模型,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是从行为者的约束条件入手,来解释作为众多行为者之行为模式及均衡结果的制度现象。我现以备受关注的“浙江模式”为例,说明经济学家如何使用这种分析方法。

1978年以来,浙江省的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有一个显著特征,即民营经济起步和市场发育较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领先一步,且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市场扩张极为迅速,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所以,我们把“浙江模式”概括为:由内生的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说,“浙江模式”不仅仅是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以区域性突破为特征的制度变迁模式。我们可以从浙江人面临的

约束条件入手,来解释“浙江模式”的形成原因。

我们首先从民间的视角来考察,“浙江模式”的形成与浙江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密切相关。

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是由区域内经济主体的行为决定的,而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受到特定的初始条件制约,因而,一个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一定与该区域初始约束条件有关。在这一组初始约束条件中,区域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是两个最重要的约束条件。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发轫于农村地区,民营企业大多是在农村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考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初始约束条件时,重点考察浙江农村地区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农村地区的自然禀赋首要是农村人口与耕地面积。20世纪70年代末,浙江省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实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活动不再受人民公社所属的生产大队及生产小队统一调配,农民自己开始拥有了一定程度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就为农民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农民是否从农业生产活动转移到非农生产活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区域内人均耕地面积。浙江省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人均耕地面积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地矛盾一直很突出,许多地区单靠农业是不能谋生的。因此,在浙江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虽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但因人均耕地面积过小,农民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也在快速递减。作为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农民,在面临着因农业耕作的边际收益递减而难以维持生计之时,自然就逐渐从事由农业耕作中抽身出来,开始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业生产活动。

不过,非农生产活动能够在浙江农村大规模迅速扩展开来,一个重要条件是浙江农村的历史禀赋。具体地说,这种历史禀赋是浙江农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历史传统及商业文化。这种经商传统在人民公社时期仅仅中断了二十余年,而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并没有完全中断(如永嘉县的弹棉花,义乌县的“鸡毛换糖”和永康县的补锅碗等),在浙江农村保留下来了许多有手艺、懂制造、善经商的能人。农民的非农生产活动与单纯的农业生产劳动相比较,前者与市场交换的关系远比后者要密切得多。由于非农生产活动的经济收益大于单纯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收益,加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缺经济条件下,简单的产品加工和贩运就能带来较高的收益,这种现实的经济利益能够有效地激活农民的经商传统,大规模的非农生产活动就在浙江农村扩张开来,浙江农村工业化的进程由此启动,区域的制度变迁也由此发生。

再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来考察,我们看到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对浙江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1]毋庸讳言,在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有时是清晰和坚定的,有时也会出现含混和动摇。但是,从整个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来看,浙江省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在总体上属于“货币主义战略”。^[2]“货币主义战略”的精髓是调动个人的主动性和激发企业家精神,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具体地说,货币主义战略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创造运转完好的市场,来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把私营经济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和推动力量。问题在于,是何种原因使得浙江的地方政府作出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当然,中

中央政府的方针和政策是影响地方政府发展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政府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全党和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因此,“发展经济”可以被视为各级地方政府共同具有的偏好。然而,一些地区的私营经济较早期和较好地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与支持,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形成了良性互动,而另一些地区却不是这样。导致地方政府的战略选择出现如此差异的原因何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同样需要从地方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来入手。

首先,地方政府的战略选择受制于本地区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如前所述,在具备特定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的地区,计划体制外的民间经济活动从未真正中断过,即使在计划经济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高压之下,人们仍在从事与区域商业传统相关的民间经济活动。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对这些“资本主义尾巴”心知肚明,也曾经花费气力去限制和打击。可是,区域商业传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方政府的打击大多徒劳无益。况且,在自然禀赋较差的地区,地方政府也清楚这一类民间经营活动是当地老百姓维持生计的必要手段,故逐渐默许民间经营活动的存在。当中央政府的政策开始放宽之后,民间经营活动就成规模地发展起来,此时,地方政府原本因无奈而持有的宽容和默许态度,就会因中央政府的许可和民间的支持而得到强化与稳定,并逐渐形成有利于民营经济在本地区发展的宽松环境与地区政策。

当然,地方政府在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和地区政策时,需要谨慎地对意识形态或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地方政府会权衡民营经济发展所增加的地方财政收入与可能

诱发的政治风险孰大孰小。在这两者的权衡中,来自民间的商业智慧能够有效地帮助地方政府降低政治风险,如民营企业通过“带红帽子”、“挂户经营”、“股份合作制”等方式,将自身“包装”成符合意识形态标准的“集体企业”。因此,我们看到,那些商业传统较深厚的地区也是民营企业采用变通方式最多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就能够更为大胆地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其次,地方政府的战略选择也与本地区计划经济的遗产有很大关系。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及下属部委在各个地区投资的差异性极大,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于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认同也有很大差别。具体来说,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投资相对较少的地区,地方政府就很少期望通过“跑部钱进”的方式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这类地方政府对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认同程度低,故在中央实施“分税制”之后,就比较容易摆脱对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依赖,倾向于探索非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道路,从而更有积极性鼓励和支持本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

简言之,“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这一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分析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也适用于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因而是经济学家解释制度形成与制度变迁的基本框架。曹正汉博士采用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但也不限于此。如他引入“制度的功能”与“深层结构”这两个概念,并以此作为解释制度现象的主要因素,就与经济学家从约束条件入手解释制度的传统有所不同。虽然我主张遵循经济学家的传统,但我认为,对制度分析方法作跨学科的探讨是一个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